

陕西大学堂教学活动考

姚 远

(西北大学 学报编辑部,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根据新发现的清末报刊文献,对湮没不彰的陕西大学堂的学制与教学、教习与师资管理、学生管理与学潮作了历史性的考证。结论指出:陕西大学堂的创建,奠定了近代陕西高等教育的基础,也成为陕西地方教育由书院制度向学堂制度转折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以引入西方高等教育学制和管理为特征的新型教育体制的形式。

关键词:陕西大学堂;西方学制;东洋教习;清末学潮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02)04-0164-06

清光绪廿七年十月(1901),陕西巡抚李绍棻奏请在原游艺学塾旧址(即原崇化书院旧址)和西安六海坊原咸宁、长安两县考院旧址创建陕西大学堂。清光绪廿八年三月二十五日(1902年5月2日)正式开学,首批入学40名学生。清光绪廿八年四月十二日(1902年5月19日)陕西巡抚升允再奏获准,并有光绪帝“著即督饬,认真办理,务收兴学实效”的朱批。清光绪廿八年四月廿四日(1902年5月31日)奏准在陕西大学堂“设农务、工艺两斋”,光绪帝有“农务工艺足厚民生,著即认真兴办,毋涉敷衍”的朱批^①。根据清末关于京师设大学堂,省会设高等学堂的制度,陕西巡抚夏时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将陕西大学堂改为陕西高等学堂。宣统元年(1909)始办正科。辛亥革命后,改为陕西高等学校。1912年3月,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张凤翔决定将陕西高等学校、关中法政大学、陕西实业学堂、陕西客籍学堂等合组为西北大学。陕西大学堂是为陕西,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创办最早的地方性高等学府,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有关陕西大学堂的历史长期湮没不彰,仅有极少的文献涉及[1-4]。本文拟对其学制与教学、教习与师资管理、学生管理与学潮等作初步考证。

一、学制与教学

陕西大学堂初期的学制并无明确规定,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拟订的《高等学堂更订章程》才对学制作了“补习普通科学一年,高等正科三年……四年毕业”[5]的明确规定。然而,这一学制并未得到切实执行。在首期学生入学3年时,兼任监督樊增祥曾就此原因和对策作了分析,他认为:“陕省大学堂开办之始,考送学生多不合格,夫子之门,盖亦杂矣,忽忽三年,若竟因仍不改,必至传习愈非。驻堂学生之不合格,非止一端,要以嗜好为首,先禁戒之事欲峻整规条,以勉中程,即不能不县为厉禁,以分别去留。”[6]看来,这既有中等教育基础欠佳的原因,也有学堂管理上的原因,特别是前者可能是造成学制执行不力,又一时难以解决的关键因素。实际学制的执行,大约均为6年左右。第一期学生本应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底毕业,实际上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陕西巡抚曹鸿勋才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按中学期满办理中学毕业,后又奏,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第一期学生才正式办理中学毕业,实际在堂学习6年半。第二期学生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入学,到宣统二年(1910)办理中学毕业,实际在堂学习6年。第三期学生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

收稿日期: 2002-04-05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委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JY99335)

作者简介: 姚 远(1955-),男,陕西岐山人,西北大学编审,主要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

① 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入学,到宣统三年(1911)毕业,实际学制亦为6年。实际上,高等学堂授予中学毕业资格的情况并非陕西独有,“查河南、福建等省的高等学堂均以开办4年暂照中学毕业奖励”,陕西巡抚亦据此认为“陕省事同一律,自应援案办理”[7],即使是京师大学堂,到辛亥革命前亦无正科毕业,仅有120余名预科毕业生。

在课目和课程设置方面,陕西巡抚升允在开办大学堂的奏折中提出了“教法当以伦理为先,次及经猷材艺”的原则。据此,陕西大学堂总教习屠仁守拟定了课目。其中,中学分为4门16目:第一门为性格致,分明伦、修身、综物、博文;第二门为政治时务,分治纲、掌故、内政、外交;第三门为地舆兵士,分形势、绘图、法制、韬铃;第四门为天文、算术,分测候、推步、元化、积微。西学也有4门,即算艺科、质测科、电化科和文语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监察御使王步瀛曾抄得陕西高等学堂课程表(见表1)。

表1 陕西高等学堂课程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英文	日文	英文	英文	算术	英文
历史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日文
英文	讲经	讲经	算术	英文	日文
日文	日文	日文	日文	日文	地理
算术	英文	日文	地理	伦理	体操
理化	体操	中文	体操	历史	体操

这些课程每周安排有36节,即36学时,每天上课6学时,自习4学时。其中外语达20节,而且外语已被分为普通外语、理科应用外语和历史地理应用外语3种类型。表中所列,只是学堂某学期的课程,据《秦中官报》等所载,第一期学生还开设有中国经史、中国文学、博物、图画、法语(英、法、日语任选一门)等课程。在“中学”4门中,学生可任选一门作为专业,重点课目为经史、舆地、算术,尤重诵习小学四书、五经,浏览历代史鉴,用以“厚植根柢”。西学课程是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聘回东洋教习并购回图书、仪器后才开课的,其重点科目为外语、普通西学、格致等课程。全省学堂的课程中,修身(遗规、古诗歌等)、读讲经(春秋、左传等)、国文(阅读、作文、书法等)、外国语(读法、译解、会话、文法、作文、习字)、历史(中、外史)、地理(分省地理、地图)、算学、博物(植物、动物、标本)、图画(手绘、器绘)、体操(普通体操、兵式体操)等课程是统一设置的,按学堂类别区别深浅,或增设课目。因此,陕西学务处参考中外各学堂

表式,订出了基本课程表样式,供各学堂使用[8]。

课程的开设由于受师资聘请所限,常常不能如期开出,造成时多时少或任意增减的现象。这种现象到了清王朝覆灭前夕,已达到较为严重的程度,陕西学司不得不于宣统二年(1910)5月至7月前后两次向高等学堂发出“请将该堂学科切实整顿”的照会。该文指出:“立一校必收一校之效果,历一年即有一年之进步,倘学科任意减少,程度未能画一,于教育前途窒碍实多。前以贵堂课程种种不合,曾经照会在案,兹阅五月份所送讲义,高等科仅有经学、近世史、兵学三门,余均从阙;中学科亦少外国语、化学、地文三科。复核其教授程度,又多与年级不符,似此办法,不特违背定章,深恐有碍毕业,仍希贵监督转饬教务长,设法更正,务合定章,庶免参差不齐之弊,……迅速见复施行”[9]。清光绪三十三年(1906)9月,监察御史王步瀛曾因高等学堂英文课时太多,而上奏批评其“荒落中国根本学问”,是“本末倒置”。高等学堂则撰文反驳,是趁有新聘东洋教习,“故多加钟点”,认为王步瀛的奏折是“执一偏之成见,生学界之波澜”,“将无作有,指素为缙”[10]。

对于课程设置和学生实际水平问题,恐不能尽听一言。当学堂开学后的第四年,即开始选派留日学生。校方也认为:“学堂肄业诸生,不乏聪明可造之士。”[11]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从日本聘回5名东洋教习后,学堂监督也认为“堂中科学,乃臻完备”,“中西书籍、仪器标本、衣、械、饮食,无不具备。”[12]陕西巡抚曹鸿勋亦认为:其“甲、乙班学生……于中国经史、文学具有根柢,而地理、算学、博物、理化、图书、体操、英、法、日语亦皆分科讲习,各有可观,虽比较高等稍形不足,而视中学堂程度殆已远过”[13]。从高等学堂考取客籍学生超等第一名尹钧在《秦中官报》发表的《德育智育体育论》来看,其对德、智、体三者关系的论证,具有相当的中、西学功底。其论文不仅注意用孔孟儒学进行论证,而且还引述了西方亚里斯托儿、斯巴达、毛塔耶尼氏、斯宾塞尔等人的观点,认为日本“以东洋道德、西洋工技合之,始成,是其智育、体育得力于西学”[14]。他认为中国则要“采泰西智育、体育之原蕴而灌输于斯民神经中,复取吾国之性理天道,昌明而阐发之,体以植德之基,智以广德之用,庶几,民俗以纯,民力以强,民智以开,我禹域之黄种不难骧首亚东,一跃而登于20世纪大舞台之上,虽强如英法吾何畏彼哉”[14]。此文“胸罗廿四史,囊括五大洲而后下笔,为文可谓极尽词章之能事”[14],集中地代表了学堂学生融通

中西的学习水平。这都说明,陕西高等学堂的课程设置和学生水平,绝不能一概否定,虽无高等正科毕业生,但已于清宣统元年(1909)开办高等正科,至1911年应该毕业的高等正科学生因辛亥革命而推迟毕业,而在1912年成立的西北大学中大多补办了毕业证书。因此,陕西大学堂至高等学堂,为陕西培养了第一批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这一点,功不可没。

学堂的校历在办学初期和中期略有不同。光绪廿八年(1902)的《学堂条规》规定每年年假为1个月,每月逢10、20、30日休假,中秋、端午和清明节亦各放假1日。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高等学堂更订章程》规定每年放年假、暑假各1个月,旬假改为每星期休息1日,中秋、端午和清明节仍各放假1日。

学堂的考试分为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5种。“预科毕业生即行升入正科无庸录考,除以上5项考试外,各科教员随时考问。考试分类以百分为满格,共分5等”[15]。其中学期考试和年终考试满80分以上为最优,或满60分以为优等,可获奖励;20分至40分为下等最下等,将留原级补习或令其退学。毕业考试成绩分为最优等、优等、中等、差等、最差等,考为最优等者奖予“拔贡”出身,优等作为“优贡”,中等作为“岁贡”,下等作为“优廪生”。

二、教习与师资管理

“关中僻在西陲,师资合格之员尤难”[16],因此,师资问题一直是困扰陕西办学的关键问题。陕西大学堂主要从3个渠道延聘师资:一是从省内选拔,包括从本堂优等学生中留用,如光绪三十一年(1906)七月从本省长安县所聘的廪生汪如波,即被充任算学教习(月薪平银20两);二是从外省选聘,比如光绪廿九年(1903)二月初聘,三十一年(1905)续聘的山西猗氏县癸卯科进士狄楼海,即充任算术教习;三是从日本选聘日籍教习或中国留学生,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从日本聘回田中、足立、菅野、叶董等4名教习,后又聘回铃木直,增至5位。现可知名的到堂教习有:屠仁守(总教习)、吴树芬(总教习)、李异材(数学教习)、狄楼海、陆元平(算术教习)、刘春谷(政治时务科算术教习)、杜斗垣、毛昌杰、刘葆锋(数学教习)、王猷(英文教习、庶务长、教务长)、董明铭(体操教习)、周铭、汪如波(数学教习)、高普烽(数理教习)、邵力子(世界史教习)、张子安(地理教习)、宋元恺(兵学教习)等。

首任总教习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清同

治十三年(1874)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1875~1908)中,转御史。光绪十五年(1889),因得罪慈禧太后被革职。离京后,主讲于山西令德堂。光绪廿六年(1900),起用为五品京堂,授光禄寺少卿。次年冬陕西巡抚李绍棻奏请允准为陕西大学堂总教习,光绪廿八年(1902)到堂任职,次年十二月因病离职。陕西巡抚升允当月廿四日的奏折称其“品端学邃,到堂以来,综览教规,发明正学,不厌不倦,先后两年在堂,诸生因多可造之”。

分教习狄楼海,山西猗氏县人,癸卯(1903)科进士,授刑部主事。光绪廿九年(1903)十二月被聘为陕西大学堂教习,主讲算术。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务,聘请日籍教习,回国后继续任教。

早期数学教习中的李异材(1858~1937),又名仲特,陕西蒲城人,为清末民初陕西著名数学家,著有《开方数理图说》和《级数比类》等。清光绪四年(1878)中秀才后,在乡间设馆授徒。光绪十五年(1889)被选为三原宏道书院上舍生。光绪廿四年(1898),主讲于甘肃兰山书院。光绪廿八年(1902)被聘为陕西大学堂教习,光绪廿九年(1903)参加川汉铁路勘测。光绪三十二年(1906)再任陕西高等学堂算学教习。后曾任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陕西舆图馆馆长等职。

世界史教习邵力子(1882~1967),原名闻泰,仲辉,浙江绍兴人。光绪廿九年(1903)中举,为陕西候补县令。光绪年间留学日本。他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日本考察时被聘为陕西高等学堂教习,次年入堂讲授法文与西洋史课程,并在师范学堂兼任西洋史教习,后因支持学运被清陕西当局驱逐出境。

算术教习刘春谷(?~1926)为陕西长安人,清光绪甲午举人,曾任四川知县。民国元年(1912)任陕西实业厅厅长。他在光绪廿八年(1902)被陕西巡抚升允聘为陕西大学堂政治时务科教习。

分教习杜斗垣,陕西米脂人,辛卯(1891)科举人。陕西大学堂创建伊始,即被聘为分教习,主讲数学。光绪三十年(1904),榆林知府延聘其创办榆林中学。辛亥革命后,任陕北联合中学国文教员。

数理教习高普烽,字竹轩,陕西榆林人。考至京师大学堂习德文。清宣统年间(1909~1911)自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即受陕西高等学堂之聘任教习。民国年间出任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旋任农业学校校长。

兵学教习宋元恺(1870~1917),字向辰(又作相臣),陕西耀县人,清末廪生,曾在三原宏道高等学堂

求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科、陆军士官学校、东武学校。其间入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奉孙中山指示,在朝鲜、大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后随井勿幕返陕,先后任陕西高等学堂兵学教习、陕西农业学堂日文教员,并从事革命活动,介绍学堂中不少师生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他亲往军装局把枪弹配给学生,让学生回乡组织民团,保卫地方。在陕西辛亥革命中任外交部部长,参加西路战役时,任炸弹队总队长,率部在礼泉等地作战。西路议和后任交通司司长。其间,建议陕西先后派出200余名留日学生,并于1913年辞司长职亲任陕西留日学生经理。1916年自日归陕任乐群学社社长。1917年,张勋复辟后,按孙中山密令,组织陕西讨逆军,任总司令,在与阎锡山部的战斗中牺牲。

日籍教习中的足立喜六,原籍日本静冈县磐田郡袖浦村字冈。明治三十一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明治三十九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月,应清政府聘,任陕西高等学堂教习。至明治四十三年(清宣统二年,1910)二月回国。他在西安时常踏访古迹,晚年对历史地理多有研究,并将其数理之长用于考古测量,著有《长安史迹考》(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35)等。1996年,日本田边昭三先生与足立氏之孙女曾同来西安踏访,并与西北大学教授有联系。

中学教习和西学教习的管理均实行合同聘请法。合同每年订立一次。学堂又设“功过簿”,记录教习、学生、提调、委员各司事夫役的优劣业绩,并视具体表现给予奖惩或决定去留。按照《大学堂章程》,如教习德不称位,才不称职,由总办和总教习商请陕西巡抚随时更换。按清廷《奏定学务纲要》,凡毕业学生在60名以上,教习和管理人员工作年限在5年以上者,按异常劳绩授奖,工作年限在3年以上者,按寻常劳绩授奖。陕西高等学堂曾有两次共15人授奖:一次是宣统元年(1909)授奖10人,一次是宣统三年(1911)授奖5人。其奖励内容多系升官晋阶。如学堂监督周鏞至宣统三年(1911)任职满5年,即由陕西巡抚恩寿奏准授奖,由法部主事升为员外郎并加四品衔。另有英文教员兼斋务长(后转任教务长)王猷、庶务长姚文蔚、会计官袁鸿逵、杂务兼会计官胡明显等,均曾获奖,并以直隶州知州补用。对于外籍教习的管理较具体:一是明确归学堂监督节制;二是规定薪金按西历逐月发给,含饮食、衣服、医药、仆役在内;三是聘期一年即12个月,含年暑假,合同期内违约者辞退,只给定额川资,续聘须提前在合同期满一个月前商定;四是由学堂负担来华和回国旅费;五

是其家眷不能住在堂内,单身者可在堂内住宿;六是病假一个月内照付薪水,超过一月由本人负担,超3个月即解聘,如病故,除发旅费外,发给3个月薪水的抚恤金;七是合同一式三份,分存于受聘人、省学务处和学堂。

三、学生管理与学潮

陕西大学堂的生源初拟应来自中学堂的优秀学生,但因中学堂的设立是与大学堂几乎同时进行的,故尚无中学毕业生。因此,学堂初期的招生只好暂由各府、厅、州、县按经义史招考,报送大学堂选择录取。由此,造成“陕省大学堂开办之始,考送学生多不合格”[6]的局面。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高等学堂更订章程》颁布后,学生仍以200人为额,考选时备取数十名以便传补,又进一步明确规定除旧有在堂学生和当年考取的学生外,非中学堂毕业生不能躐等收入,年龄定为18岁以上,35岁以下,还要求身家清白,体质强健,无不良嗜好。

学生总数计划预科200名,每年伙食银6600两,正科学生100名,每年膏火银2200两,共8800余两。办学初期,学堂拨付伙食费,由学生自雇炊工起火;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改为食堂制,学生依次分为精舍生、上舍生和中舍生,由“中”入“上”或入“精”且参加月考、季考者,均可在月发2两膏火银的基础上再加发2两;光绪三十一年(1905)更订章程之后,开始酌收学费,其中陕西籍学生每年收银30两,用于学生伙食费用25两,客籍学生每年收费60两,可享受奖学金。

学生进堂3-4个月期间,由教习和提调进行考核和复试,满3个月后,由总教习会同总办再行复核,以定去留。“其天资高明而心术不正者,立时斥逐。亦有心术纯正而赋质少拙者,考核以后再留三月,以观后效,如两次考核实属不堪造就,不准再留”[17]。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规定:“开学四个月后,察看学生,如有颓惰不能授学者,即行黜退”[5]。

学生管理制度主要反映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光绪三十二年(1906)先后制定的学堂条规。这些条规大致包括4个方面:一是忠君,规定“每年恭逢皇太后万寿、皇上万寿、皇后千秋,由总办率领诸生齐班望阙行礼”;二是尊孔,“恭祀至圣先师孔子暨本省诸先贤先儒,每年延师、开学、散学之期,由总教习、教习、总办、提调率领学生……行礼,每月朔(初一日)望(十五日)则由总教习、教习率领学生行礼并宣读《圣谕广训》一条”;三是礼让,“教导诸生以明廉

耻,知羞恶,敦崇礼让,激发忠良为第一要义”,“有违犯堂规,不敦品宜,不守礼法及梗顽不化,不能完成课程者,或量予记过,或降列等次,或开除名额,应由各教习商请总教习会同总办提调秉公核办,其父兄不得到堂辩论,违者治以妄诉之罪”[17];四是戒忌,诸如教员上堂学生必起立致敬,必须起立致答,不许当堂提问,课间不许会客,不得赤膊赤足失仪,吸水旱烟限于憩息室内等等。大学堂留日学生马凌甫回忆说:“我们这个母校原是一个理学王国,学术思想和政治水平都在时代的后面,不但有关革命的书报列为禁品,就连壬寅 癸卯的《新民丛报》也认为是洋学书籍,不让学生多看。……学生在文字中偶尔引用新的名词,即目为狂悖而严加申诫。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绝不是少数人主观愿望抑制得住的。……改为高等学堂,……学堂才开始有了新的气象,学生集会结社也才得到一些自由。”[18](P83-100)

尽管学生的言论和政治自由受到严密控制,但学堂的学生仍有一些大的政治活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陕西高等学堂、陕西法政学堂联合师范、中学、陆军等学堂的全体学生,呈书给陕西巡抚曹鸿勋,抗议向英国出卖陕西铁路权,呼吁陕西自办洛潼铁路。曹鸿勋斥责曰:“吾陕土风纯谨,何应染此器习”[19],断不许学生参政。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陕西高等学堂地理教习张子安因未参加谒圣礼而遭侮辱,张教习提出抗议,遂被学堂监督周镛解雇。为此,学生向监督、提学使交涉,要求挽留张教习,均遭拒绝,遂引发高等学堂学生全体罢课直至退学,并撤离学堂。200多名学生离校后分住城内的礼泉、咸阳、商州、蓝田各会馆,并仿上海中国公学,制定自治规则,设稽查、调查、会计、书记各员,处理日常事务。退学学生以礼泉会馆为总机关,并准备在渭南成立公学。这次学潮得到全省学界的大力支持,陕西当局惟恐事态扩大,撤销了庶务员和监学官二人,由教育总会会长等出面调停,答应了学生的要求,罢课遂结束。这是清末陕西学界最大的一次学潮,给行将覆灭的清廷以很大震动。随后,陕西当局照会高等学堂,并转发清廷学部札,要求学堂“管教各员,随时董戒学生,不准联盟纠众,立会演说及潜附他人党会”[20]。之后,高等学堂的一些学生参加同盟会的秘密活动,远在东洋的高等学堂首批留日学生郝朝俊、马凌甫、张荫庭、钱鸿钧、谭耀唐、崔云松等先后创办《秦陇》《关陇》《夏声》等月刊,呼应陕西的反清斗争。《夏声》第6号即曾发表署名“大无畏”的《陕西高等学堂之纪事及评论》一文,呼应学潮。大学堂

留日学生马凌甫、王芝庭、张荫庭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节期间返乡省亲,即与同学康寄遥、王授金等筹组一个爱国团体,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8]。原陕西农业学堂学生郑伯奇回忆:“高等学堂……是由旧的书院改组的,学生年龄较大,资格较高,与本省在北京、上海以及留日学生多有联系,在历次学生运动中俨然居于领导地位。”[21](P101-105)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西安学运达到高潮,农业学堂由于对教学和生活管理不满而罢课,并全体离校入城,高等学堂学生也予以声援,并派代表马彦耕前往慰问。留日高等学堂学生中的马凌甫、张荫庭已加入同盟会,并返回南京作为17省代表之一,参加了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陕西作为武昌起义的首先响应省份,其响应武昌起义的大会就是1911年10月27日在陕西高等学堂召开的,并在此宣布成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陕西大学堂的毕业生崔云松任财政部长(后任都督府秘书长),郝朝俊任副部长,曹澍任教育部长,钱鸿钧为司法部副部长,高等学堂兵学教习宋元恺任外交部部长,其余参加辛亥革命的不在少数。

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开始有73名毕业生起,至宣统三年(1911),共有3期毕业生,共毕业学生208名。其中:考为优等,奖以优贡出身者31人;考为中等,奖以岁贡出身者161人;考为下等,奖以优廪生出身者10人。其中又有白常洁、高冠英、王芝庭、钱鸿钧、曹澍、崔云松、张荫庭、郝朝俊、马凌甫、张星岩等10余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取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也有10余名由陕西巡抚选送北京京师大学堂或青岛、浙江等地的高一级学堂或分科大学深造,有不少学生被派往充州县学堂任教习。另有一些师生参加辛亥革命,甚至为推翻封建王朝献出生命。首批留日归国的学生大多成为辛亥革命后西北大学的创始人或新政权的领导骨干。

四、结 论

陕西大学堂是为陕源西北大学的源头,它不仅为陕西高等教育的开端,也标志着我国西北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肇始。

陕西大学堂教学活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系统开设了英文、日文、质测、理化、积微、天文等西学课程,延聘了陕西最早的外国籍教学,也派出第一批较大规模的留日学生,这在传统文化积淀较为深厚的陕西,无疑激起层层波澜,发生了抵制尊孔、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向外国出卖铁路

权等学潮,直到最后参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这一方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也反映了上世纪初期,封闭落后的陕西勇于接收新文化的积极姿态,实现了由书院制度向学堂制度的转折和成功实现了第一次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这无疑充实和丰富了近代秦文化的内涵,是作为近代秦文化策源地之一的西北大学向区内辐射出的第一束文化之波

参考文献

- [1]杨汉铭,孙西军.20世纪初我省第一所最高学府陕西大学堂[J].西安文史资料(内部发行),1986(9):88-102.
- [2]姚远.中国西部最早的高等学府——陕西大学堂[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5(3):1-5.
- [3]姚远.西北大学的源流与承袭[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7(3):81-86.
- [4]姚远,刘舜康,赵弘毅,等.西北大学的两个历史源头[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0(3):127-131.
- [5]仇继恒.高等学堂更订章程[J].秦中官报,1905(1):7-8.
- [6]樊增祥.批大学堂肄业生渭南生员贺鸿恩禀词[J].秦中官报,1905,6(1):1.
- [7]曹鸿勋.奏高等学堂学生补习中学期满请先办中学毕业折(1907年6月)[J].秦中官报,1907(4):138.
- [8]曹鸿勋.札学务处饬发学堂表式文[J].秦中官报,1905(6):1-5.
- [9]陕西学司.照会高等学堂诸将该堂学科切实整顿文[J].

- 教育官报,1910(6):9-10.
- [10]陕西高等学堂.驳监察御史王步瀛奏文[J].秦中官报,1906(4):6.
 - [11]陕西大学堂.详请咨送陕西省各学堂挑选学生前赴东洋肄业由[J].秦中官报,1905(3):6.
 - [12]樊增祥.陕西高等学堂开学训词[J].秦中官报,1906(2):32-33.
 - [13]曹鸿勋.奏高等学堂学生补习中学期满请先办中学毕业折[J].秦中官报,1907(6):138.
 - [14]尹钧.德育智育体育论(含批语)[J].秦中官报,1906(4):68-69.
 - [15]学院朱.移送高等学堂章程文(附章程)[J].秦中官报,1906(5):161-168.
 - [16]陕西大学堂.聘分教习文[J].秦中官报,1905(1):8-9.
 - [17]陕西大学堂.大学堂章程[J].秦中官报,癸卯年(1903年),9月份第1期.
 - [18]马凌甫.回忆辛亥革命[A].陕西省政协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 [19]曹鸿勋.批高等师范法政中学陆军各学堂全体学生等为全陕铁路必欲自办恳请代电以杜觊觎禀[J].秦中官报,1907(2):98-99.
 - [20]陕西学司.学部札凡学堂管教各员随时董戒学生不准联盟纠众开会演说及与闻各会之事一体遵照文[J].教育官报,1910(6):11-12.
 - [21]郑伯奇.回忆辛亥革命前夕陕西的学生运动(1961-10-09,西安)[A].陕西省政协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刘欢]

A Review of Shaanxi Grand School and Its Teaching Programme

YAO Yuan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published in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a historical argument was made on the oblivious Shaanxi Grand School and its school system, teaching programme and students' movements. From this we ge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aanxi Grand School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haanxi and mark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ystem of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to the system of modern school characteristic of the wester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teaching programme.

Key words Shaanxi Grand School; western school system; eastern teaching programme; students' movement in the last Qing years